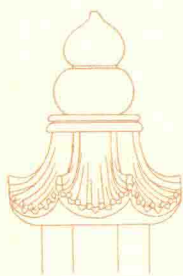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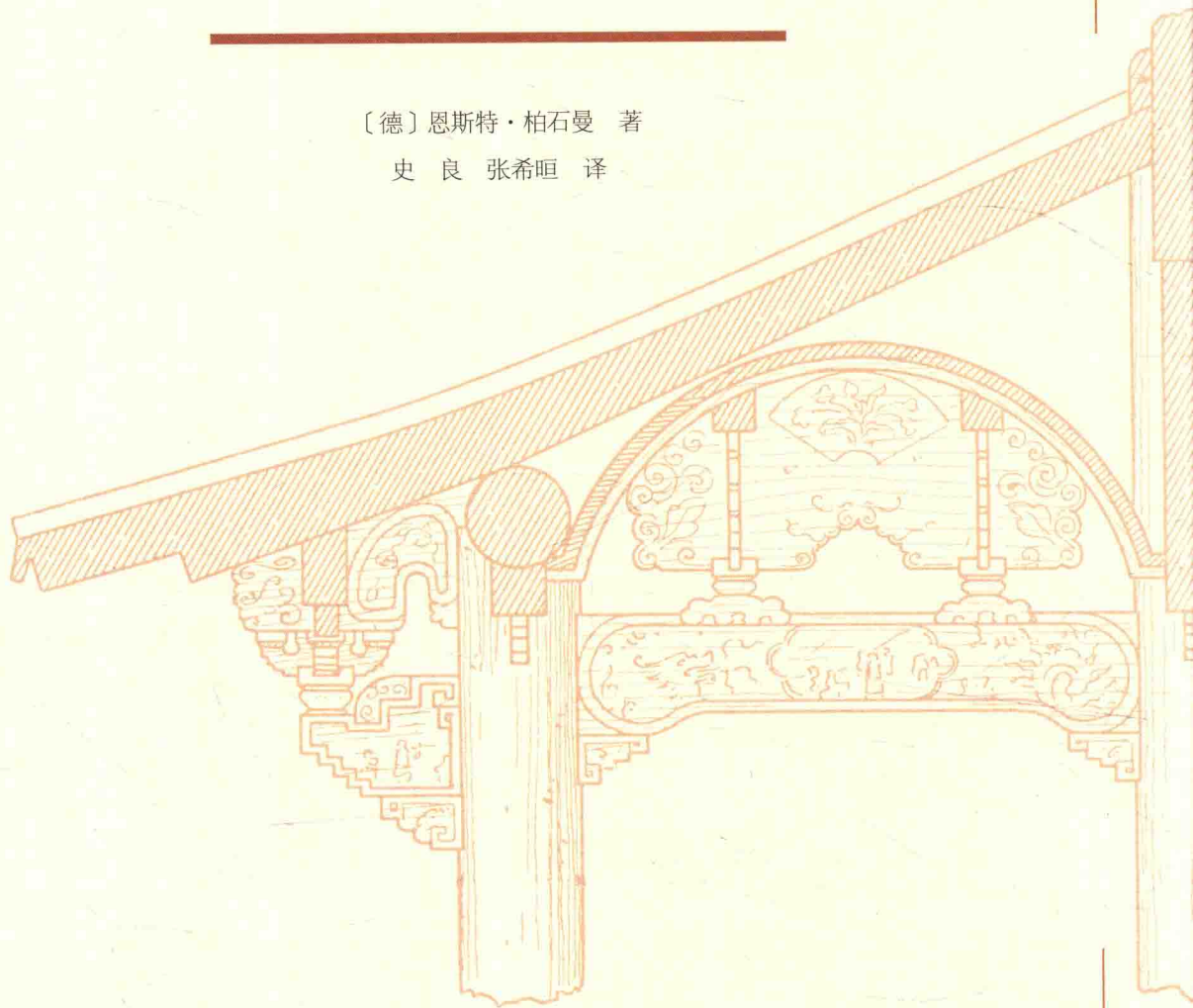
— 舟山海外档案史料文献译丛 —



普陀山建筑艺术 与宗教文化

〔德〕恩斯特·柏石曼 著

史 良 张希珏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舟山海外档案史料文献译丛 —

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

〔德〕恩斯特·柏石曼 著

史 良 张希畋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 / (德) 恩斯特·柏石曼著;
史良, 张希暄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舟山海外档案史料文献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2860 - 5

I. ①普… II. ①恩… ②史… ③张… III. ①普陀山 —
佛教 — 宗教建筑 — 建筑艺术②普陀山 — 佛教 —
宗教文化 IV. ①TU-098.3②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326137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普 陀 山 建 筑 艺 术 与 宗 教 文 化

〔德〕恩斯特·柏石曼 著

史 良 张希暄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 东 临 沂 新 华 印 刷 物 流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860 - 5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 78.00元

Ernst Boerschmann

Die Baukunst und religiöse Kultur der Chinesen

Band I: P'u T'o Sha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Berlin 1911

本书根据柏林奥尔格·赖默尔出版社1911年版译出



恩斯特·柏石曼

作者简介

恩斯特·柏石曼(1873—1949),德国著名建筑师、摄影师、汉学家,柏林工业技术大学中国古建筑学教授,也是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的德国建筑师。

他在1906年至1909年间(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穿越了中国的十四个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拍下了数千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等极其珍贵的照片。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对于中国和德国的建筑学界、文化界,以及中德两国之间的交流,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译者简介

史良,1988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从事德语文学理论及文化学研究,已发表文章有《回忆的模仿》《文明拟态》《卡夫卡小说〈诉讼〉中的“罪”与“耻”》。

张希晔,柏林自由大学新闻传播学学士。

普陀山

观音圣山

格言

什么是一般？个别的情形。

什么是特殊？千百万种情形。¹

歌德

（内附208张图片及32幅插图）

1 原文出自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此处翻译引自董问樵译：
《威廉·麦斯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页。

谨此向大力推行此项目的

最为尊敬的

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

威廉二世陛下

致以最为崇高的敬意



插图1 观音

观 音

慈悲女菩萨

手持净瓶、杨枝
乘神兽、踏莲台
破浪而行

人世间的苦难
她皆感同身受
故而她要播撒那
取自西方的甘露

序 一

舟山历史悠远，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活。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舟山置翁山县，此后屡有变迁。明清两朝，还出现过几次舟山居民迁至大陆的情况。清康熙朝颁“展海令”，舟山始置定海县。在历史上，舟山是中国通向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重要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是东南沿海对外开放最早的口岸之一。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舟山群岛在中西交往中逐渐成了一个繁荣的国际贸易口岸。

为了更好地还原舟山历史、挖掘海洋文化，近年来，我馆通过各种渠道加大舟山海外档案史料文献的征集力度，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2014年，舟山籍旅日商人金滨耀先生觅得1911年德国柏林出版的德文版《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并通过其任职于中央电视台的堂弟金辉先生寄存到我馆。我馆立即进行了数字化，并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史良、柏林自由大学学生张希暄等进行翻译。

该书作者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是一名德国建筑师。作为普鲁士皇家文化部建筑专员，他在1906年至1909年间（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穿越中国十四省（当时中国共有十八个省），行程数万里，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拍下了数千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反映各地风情的珍贵照片。回国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而《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是这一系列专著的首部作品，他称为“在中国游历期间经实地考察研究所收获的第一颗硕果”。恩斯特·柏石曼在其自序中提到，亚洲正进入全新时代，白种人抢占中国土地进行殖民统治，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机器化及现代建筑……长此以往，寺庙会坍塌，宝塔化为废墟，将无法再寻找这逝去文化的残余……因此，要赶在这些建筑被毁灭之前，进行测绘研究。

1907年12月至1908年1月，作者在普陀山考察20多天，采集了大量照片及文字资料。其中有作者精确测绘的大量带比例尺的地图、房屋结构图，以及牌匾碑刻，极其详细精致。有部分图

样原稿购自普陀山的寺庙。书中共附有208张照片及32幅插图。

我们非常荣幸地延请到同济大学副校长、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先生为本书作序，吴先生早年曾留学德国柏林工大，并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工学博士。而本书作者曾在柏林工大前身——柏林夏洛滕堡工大（Technische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学习建筑和土木工程学，并于1927年获得教授职位，这份师道传承的难得缘分，令本书在建筑与宗教艺术之外增添了许多亲切和温暖。

本书是我馆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舟山海外档案史料文献，除德国外，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曾在历史上与舟山有着不解之“缘”，这些国家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甚至私人收藏者手中都有关于舟山的文字、影像等的保存与记录。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向金滨耀、金辉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想呼吁更多海内外人士特别是与舟山有关的人士关心舟山、关注历史上的舟山，发现更多有关舟山的海外档案史料，让历史服务于现实。我馆也将拟定专门征集计划，开展海外档案史料的征集工作，将散存于世界各地的档案史料汇聚起来，尽可能翻译出来，还原舟山的历史面貌，使“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史可考，有档为凭。

舟山市档案馆

2017年2月

序 二

中华古建筑乃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国人出门驻足欧洲，往往惊叹于哥特式和罗马式大教堂之雄伟，巴洛克和洛可可式宫殿官邸之奢华，殊不知，早有欧洲人踏上中国大地，折服于中华建筑，痴迷于中华艺术。《普陀山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的作者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即为先行者之一。

柏石曼，德国建筑师。1902年，年轻的柏石曼作为德国高级建筑官员首次踏上中国大地，此亦为其建筑人生之转折点。中国古建筑遗存之多样魅力、东方文化之博大精深令其乐不思“德”。从此，柏石曼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研究中。

1906年至1909年间，柏石曼长途跋涉，踏遍晚清十四省，寻中华古建筑身影，集图纸样式，汇影像史料，堪称系统研究之旅。其时摄影技术刚问世，晚清的摄影甚为珍贵。柏石曼将镜头集中对准中国古建筑，率先定格中国古建筑影像之时，正值中国社会大革命发生前夜，此后他所记录的建筑大量遭毁，故尤为宝贵。陈从周先生曾言及，柏石曼当年所用的玻璃底片，因路途颠簸常有敲碎；跟从柏石曼的挑夫因好奇，解开了摄影机黑盒底片黑布，一大批照片因此曝光失效，令人痛惜。

柏石曼回德后，投身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中，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共三卷，1911、1914、1931/1943)、《中国的建筑艺术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1923)、《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 共两卷，1926)、《中国建筑陶瓷》(*Chinesische Baukeramik*, 1927)等记录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文化的著作，还曾于1912年在柏林举办中国建筑艺术展。柏石曼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位从建筑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近代学者。

本书原为《中国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三卷本系列的第一卷，也是柏石曼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开山之作。原书由柏石曼于1911年整理出版，书中的照片、测绘图等大多是作者1907年至1908年游历普陀山时所搜集的。在书中，他介绍了普陀山这座岛屿的基本情况，以及普济

寺、法雨寺和佛顶寺三大寺庙。其中最为详尽的是有关法雨寺这一章。这章除了概括介绍法雨寺的历史、建筑布局外，还详细地描述了寺庙入口的布局，各个大殿的结构、陈设、佛像，等等。大到大殿、佛像，小到寺内的一个佛龕、一块匾额，柏石曼均给出了详尽描绘，着实让人惊叹。此外，正如本书标题所体现的，作者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寺庙建筑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读者在翻阅此书之时，不仅能欣赏到普陀山寺庙的风貌，还能了解到这些建筑和陈设背后的传统文化及佛教故事。

因战争与革命，吾辈今日从书本中所读到的普陀山建筑早已不复当年的面貌。除了大殿，其余如佛像、陈设、墓地等，大都已经永远地湮没在岁月的洪流里。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定格住了那些在后来的动荡中不断被破坏的古代建筑与艺术品，使我们今天依然有幸能够欣赏到它们昔日的模样。书中所附的照片和草图，除了部分是向当地人购买的之外，大多都是由柏石曼本人亲自拍摄或手绘的。这些资料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历史影像，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回顾柏石曼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古代建筑与文化的魅力，使得柏石曼这样一位随军而来的建筑官产生了敬佩之情，最后做出了影响其一生的决定。一百多年前，柏石曼目睹了这些凝结着中华文明与智慧的建筑正在逐渐破败，惋惜之情油然而生，因此采取行动。一百年之后，我们作为这些智慧与文明创造者的后代，是否更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感，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付诸行动呢？我想，这是柏石曼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我们应该肩负的文化责任。

而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不会将眼光局限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之中。或者说，一个国家想要崛起和富强，离不开自身对世界文化的把握。柏石曼对中国古建筑的潜心研究与整理，是德国在崛起之时从民族文化观走向世界文化观的缩影。它提醒我们，在重视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应当走出去，习百家之所长创中华之独新。

因此，特别感谢舟山市档案馆延请译者，将本书译成中文。希望本书可以走出档案馆，来到更多人的案前。无论是建筑学界的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的读者，都可以通过本书领略到百余年前普陀山庙宇建筑的风采，与此同时，也能够愈加意识到古建筑与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并且感受到德意志民族崛起之时挖掘他国文化的用心，对于今日之中国而言，此三者都殊为必要。

吴志强

2016年12月

研究来历

本卷为笔者于中国游历期间（1906—1909）经实地考察、研究收获的第一颗硕果。该研究成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通过文物、建筑研究中国文化。

将中国建筑艺术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进行有计划的研究，这一想法应主要归功于两位先生。在进一步阐明两位先生对于该研究的具体贡献之前，我想首先对他们进行简要的介绍。两位先生分别为致力于印度东亚宗教研究的学者P.约瑟夫·达尔曼（P. Joseph Dalmann）先生，以及在过去数十年中对诸多德意志文化活动起到助推作用的国会议员、法学博士卡尔·巴亨（Carl Bachem）先生。

该项研究开创了文化学领域中的一个全新分支，对今后的研究也必将意义深远。因此，我想在此对促成该项计划的最初契机进行简要介绍，并对计划实施过程中所获得的各方帮助与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推行有关中国建筑艺术研究的想法在过去一直饱受非议。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仿佛恰恰被赋予了这项使命。

19世纪是人类交通、科技领域经历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世纪。该世纪末期，所有的民族在政治上都着眼于侵略、扩张上的比拼。这种争夺在远东地区，尤其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恰恰在世纪更迭的1900年，发生了一件在世界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西方列强联手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战争本身其实乏善可陈，其深远意义主要体现在该事件在世界史上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此后，中国被迫卷入了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浪潮。迄今为止，中国对此的态度都是理解与顺从。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整个世界也由此划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中国，一边是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消极地来看，此种划分表明中国文化同我们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自主性及其蕴含的特殊意义，让其得以

独自置身于同世界其他文化抗衡的另一端。如若考虑到战争、经济与科学探索之间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那么我们同中国这样一种高等文明之间的外在碰撞，也必然会在科学、艺术和文化领域中摩擦出新的火花。

VIII 上述种种世界历史背景构成了我完成这篇有关中国建筑文化研究的内因。

促成该研究的外因则与1900年那件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我的研究正是始于190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

在那之后我们的远征军主力还在直隶省驻扎了几年。我有幸于1902年作为建筑顾问被遣往该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年中（1902—1904），我完成了对中国的第一次考察。当时，我心中便萌生了对中国建筑、文物进行有计划的研究的念头。中国建筑设施、建筑形式的独特性，艺术创造与内在感知之间完美的结合，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便从几何学角度对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各处设施进行了勘察。然而，最终令我下定决心完成这个目标的还是一次重要的会面。1903年10月，我第二次接受委派前往北京。在此期间，我在当地德占区的军官俱乐部里结识了正在进行为期三年远东考察的P.约瑟夫·达尔曼先生。交谈中，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表现出同样高涨的热情。同时我们也都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应当从所有可能的侧面切入，尤其是要基于建筑艺术的原始资料开展研究，特别是宗教建筑艺术。该计划更为明确的草案则拟定于1904年8月我回国前同达尔曼先生在上海徐家汇进行的第二次会谈。徐家汇自1607年起便一直作为基督教教区，自1847年起成为对于有关天主教会研究的重镇。此外，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Freiherr v. Richthofen）¹ 同样为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徐家汇和北京这两个地点成为我此次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据点，并借此将研究所涉及的历史与宗教两方面完美地结合了起来。17世纪，顺治、康熙统治期间，北京几乎成为德意志甚至欧洲科学引入、传播、发展的中心。对此，德意志天主教徒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当中值得一提的有沙尔（Schall）、菲尔毕斯特（Verbiest）、托马（Thoma）、施通普夫（Stumpf）以及科格勒（Kögler）先生。每位进行有关中国学术研究的学者都会带着崇敬之情瞻仰这些天主教徒们的墓碑。这些先辈们均安葬于北京皇城西大门前风景优美的墓地，在那里，他们享受着最后的安宁。

仰仗达尔曼先生不遗余力的推荐，卡尔·巴亨博士也将该研究计划视为重中之重着手进行推介。他不仅致信时任外办国务秘书的李希霍芬男爵，并且在1905年3月17日召开的国会大会上唤起了国会对于实施有关中国建筑艺术研究的兴趣。该想法在其他政府部门，尤其是在普鲁士皇家文化部得到了广泛认可与支持。最终，研究的经费决定经由国家预算划拨。1906年8月，第二次

1 李希霍芬（1833—1905），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又译里希特霍芬。——译注

前往中国考察的经费申请获批。位于北京的使馆工作人员同样给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不仅为我安排了一个官方职务，还特地给予我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的通行特权。1909年7月31日归国之后，政府继续给予我资金上的支持，让我得以对先前的研究成果加以完善。作为供职于普鲁士皇家文化部的建筑专员，我还因这项特殊任务享受到了休假上的优待。在此，我想再次向为该研究提供帮助的所有相关机构及个人致以最为深切、热诚的感谢。

我们尊敬的皇帝陛下对于这部作品在经费上的鼎力支持实在是一种无上的恩赐。

IX

研究简介

为了阐明从建筑学角度对中国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研究所涉范围，在此我想援引我1905年2月申请基金许可时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引文稍有删节。尽管根据实际情况，后期的研究在一些方面对报告中所预期的目标有所拓展，但是报告本身已经阐明了有关中国建筑艺术研究任务的核心。报告原文如下：

如今，我们同中国建立的经济合作关系正蓬勃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远东，尤其是中国人民的礼仪、风俗、追求以及文化全貌做尽可能详尽、准确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了解不仅能让我们懂得如何同中国人相处，如何正确认识其民族特性、准确判断其商品需求，还可以为我们自己在这个庞大的国度中确立竞争优势。鉴于西方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各方面还不十分成熟，将这种认识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变得日益重要。

进行该方面研究的已大有人在，如希尔特（Hirth）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纯粹从历史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当中却不乏对于从理论研究中萃取实践经验以及将其应用于当代实践的前瞻性观望。这当中，除了部分仅凭个人印象、缺乏切实依据、对中国泛泛而谈的文学作品可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之外，还有部分意义更为重大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探索结合在一起。只可惜这些作品中鲜有德语著作。

尽管前人所做的少数专项研究已经对中国文化全貌进行了贴切而又详尽的展示，然而要完成这项研究仍属不易。诚如人们所言，一个人尽全力也差不多只能成为语言研究专家或者经济和艺术方面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对这当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足以倾尽研究者的一生。一方面，想要完全掌握汉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如若缺乏对于汉语的了解，对中国进行专项研究时便会困难重重。因此，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汉学家与其他领域专

家之间建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尽管也有其自身的困难，却基本摆脱了上述语言与专项研究之间的矛盾，并可以凭借其取得的为数不多的成果勾勒出一幅自成体系、品质极高的“中国画卷”，将博大的中华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内涵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领域正是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建筑中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精神与特质，这些是走马观花的观察者无从知晓的。然而，对于那些在文物建筑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而言，这些建筑却具有非凡的意义。

许多中国建筑都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中国建筑在其庞大的数量和迥异的风格中蕴含着很多纯构造学和建筑史范畴的未解之谜。在这里我们暂且抛开这些谜团，只需单单翻阅一下大量充斥国内的有关德国农舍及教堂研究的出版物或是其他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难发现，对一个民族及其思想甚至宗教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生活方式的认知：他们如何在自己的住宅、教堂、寺庙以及其他一切符合该民族需求、习惯以及观念的建筑物中生活。因此，对中国任何一个文化分支进行开创性研究（例如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都必须以大量素材为基础。这些素材不仅包括纯粹的历史及哲学文献，还包括那些承载着“民族意识”和特殊文化形式的房屋、庙宇整体布局及其建筑结构。

当然这些素材在可信度上都必须是经得起推敲的。为此，我们只能从大量的文学作品、历史书籍以及各种科研文献中筛选出精华，从众多充满矛盾的观点中、从充满地域和个人色彩的描述中剥离出本质。此外，素材的搜集还要从众多文物古迹着手，对其进行勘察分析。尽管这些文物已经通过图纸、照片或文字描述的形式进行了清晰明了的展现，对其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判断却仍非易事。当然，如果没有条件进行文物考察，那么那些比文物保存更长久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在日后为观点的修正和完善提供可靠依据。

对于这些素材的研究，虽然已经为早先的文化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牢固的根基，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这些素材始终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这当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主要帮助的是建筑史、纹饰史及艺术史方面的历史梳理，以及中国特色建筑在构造学方面的相关知识。

只有那些走马观花的观察者才会认为中国多姿多样的建筑文物千篇一律，仅仅满足于说出当中一些建筑的名称。在行家眼中，中国的建筑展现了一千年中一个民族经历漫长的发展达到鼎盛繁荣的历程，展示出绝伦的美感及建筑形式上的适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通过吸纳外来题材，传承本民族思想，并对艺术创作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趋于统一的总体风格中蕴含着多样性（如南北地域差异造成的风格上的迥异）。在欧